

【应用经济学研究】

从知识产品视角看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优化

陈波

(长安大学 地球科学与国土资源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 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优化是实现矿产资源有效开发和利用的首要环节。运用运筹学原理分析求解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优化问题, 该问题可转化为: 求解作为约束条件的矿产资源规划支持系统达到最佳状态。分析表明: 最优支持系统的实现依赖于矿产资源规划团队的意会知识使用效率。而意会知识的有效运用通过设计矿产资源规划团队的治理结构, 发展有利于规划团队各成员间进行充分沟通的各种社会资本来实现。

关键词: 矿产资源规划; 最优化; 支持系统; 意会知识;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7)04-0059-05

Optimizing of mineral resource planning from the view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s

CHEN Bo

(School of Earth Science and Land Resourc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use of mineral resources the author studied the optim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planning. For the purpose, taking the mineral resources planning for a kind of knowledge product and searching for the conditions and the processes of making that knowledge product optimizing are the premises her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precondition of realizing optim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planning is that there are efficient planning teams in existence. However, the main factor influencing the efficiency of teams of mineral resources planning is the effective use of tacit knowledge in every member of the teams. Therefore, the governance in the team of mineral resources planning should be well designed, and the various social capitals among the team members, which are in favor of the 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mineral resources planning; optimizing; supporting system; tacit knowledge; social capitals

0 引言

中国矿产资源虽然矿种较为齐全, 总量较为丰富, 资源潜力较大; 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少, 尤其是用量大的某些大宗矿产资源存在短缺或不足、找矿选矿工作进展又相对缓慢等问题。与此同时, 中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程度仍

不高。如何以相对不足的矿产资源持续支持高速增长的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文献[1]和[2]从国家宏观层面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政策和战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文献[3]从矿产资源的最优耗竭视角进行研究, 以支持某个区域乃至国家合理规划和调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战略, 文献[4]对矿山企业的产权制度进

行了研究,以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实际上,还有许多从国家产业安全、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等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献。

然而,除上述各种研究视角外,将矿产资源规划视为一种知识产品,这种知识产品的优化对于有效利用矿产资源以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实际上,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是高度依赖于矿产资源的规划及其优化程度的。因为作为知识产品的矿产资源规划——规划的文本及相应的各种(纸质的或电子数据格式的)图件等是政府执行各种决策(如勘探权投向、采矿权投向以及其他依法行政等)的依据。一旦将矿产资源规划看成一种知识型产品,并从规划的优化程度来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矿产资源,以支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问题,该问题就自然转化为:如何实现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优化问题。

本文正是将矿产资源规划视为一种知识产品,规划过程则是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从而研究知识产品最优化所要求的规划过程及条件。

1 矿产资源规划最优化与矿产资源规划支持系统

1.1 从优化逻辑看矿产资源规划支持系统的意义

根据优化问题的逻辑(管理科学或运筹学的原理),优化问题的求解首先要确定相应的目标函数,其次是找出相应的约束条件,最后才是在约束条件下求得问题最优的具体解决方案。如果将实现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优化,即最大程度地提高知识产品的质量确定为目标,则矿产资源规划支持系统就属于求解最优解的约束条件。相对于目标而言,只要作为约束条件的矿产资源规划支持系统达到最佳状态,将自然得到作为高质量知识产品的最优化矿产资源规划。因此,实现矿产资源规划支持系统的最佳状态就成为矿产资源规划达到最优化目标的关键所在。

所谓矿产资源规划的支持系统,就是指确保矿产资源规划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一致,确保资源有效得以利用的各种环境,即各种硬环境和软环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总和。具体地说,矿产资源规划支持系统包括制度支持子系统、技术支持子系统和信息支持子系统3个要素^[5]。很明显,矿产资源规划支持系统中各要素对于矿产资源规划过程的支持作用与规划的主体,即从事具体规划的团队是密不可分的。但无论如何,矿产资源规划是由作

为规划主体的团队进行。在既定制度环境条件下,与规划相关的各种制度约束、技术约束和规划中所需的信息约束都必须通过规划团队各个具体的成员起作用。因此,矿产资源规划的优化性所涉及的约束条件,本质上都与社会系统,即规划成员所构成的社会系统(即规划团队)直接相关。规划团队对于各种与规划有关的已存制度理解的不同,规划中对各种已存制度考虑的权重不同都会直接导致规划的优化程度不同。技术支持子系统和信息支持子系统也一样,规划团队的理解与掌握的程度不同也会直接影响到规划文本及各种相关图件的优化程度。因此,与自然系统中的优化问题求解不同,这里的优化问题求解所涉及的约束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实际上,一旦社会系统对于规划支持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理解与运用达到最优状态,就确保了矿产资源规划本身的最优化。

1.2 最优支持系统的实现依赖于矿产资源规划团队的知识使用效率

1.2.1 矿产资源规划的制度支持子系统

矿产资源规划的制度支持子系统有2个不同层面上的含义。一是对矿产资源规划活动本身进行约束的法律法规与各种规范等,如矿产资源规划的主体及其条件、规划由政府自行组织,还是经过公开招投标由政府发包出去由独立的规划队伍进行等。二是矿产资源规划中,对矿产资源开发做出安排时必须考虑的各种因素进行约束,如规划团队在规划中划出鼓励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及限制开发区时依据的各种制度约束。这些制度约束可以是有关矿产资源开发的法律法规,也可以是旅游规划、文物保护措施或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的约束。在本质上,制度支持子系统包含所有这2个不同层面上的各种制度,因为它们都是制约规划的约束条件,规划团队对它们的理解不同,所得到的规划产品的优化程度也就不尽相同。

制度支持子系统应该是各种相关的制度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使矿产资源规划与社会经济发展高度协调一致的支持子系统。从矿产资源规划支持系统的概念看,“制度”一词的含义应当采取制度比较广泛使用的含义,即“制度表现了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对一种特定情境所作出的共同反应。当然,这种共同反应会由于个体特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6]。从这一概念出发,可以进一步明确制度支持系统不仅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及政策等,而且包含各种相关组

织机构及各种相关的惯例等要素。实际上,一个和谐而有效率的矿产资源规划的制度支持系统,本质上就是政府根据各种从其他目的出发而已经派生出来的各种组织机构及其职能、各种相关的惯例等要素所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各种管理办法与实施措施等而共同形成的制度体系。因此,对矿产资源规划制度支持系统负有责任的主体本质上应该是各级政府。

在矿产资源规划的制度支持子系统中,关键性的支持制度是矿产资源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虽然包括了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但其中最根本性的要素是财产的所有权。产权结构中其他权利都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自然受到所有权的制约。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因此,从矿产资源规划的视角看,其规划的主体自然也就是各级政府。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资源规划及其制度支持系统的制定主体由政府来充当,即政府既充当运动员的角色,又充当裁判员的角色。

因此,在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且由政府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时,如何确保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优性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产权分配的效率问题,是政府这一有限理性主体是否是从事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佳主体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将矿产资源所有权行使者的政府从规划主体分离出去,使矿产资源规划必须由政府根据公开招标的原则进行招标而成为制度支持系统中的一项政策或法规。政府只充当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为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设计制度环境,而将具体的规划工作发包出去。但这样的制度支持系统是以一个高效的矿产资源规划智力库,即以高效率的矿产资源规划队伍的存在为前提的。

1.2.2 矿产资源规划的技术支持子系统

矿产资源规划的技术支持子系统包含生产技术和评价技术2个方面。生产技术主要涉及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最优化,评价技术主要以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视角,对单个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对多个项目利用成本收益法进行比较分析等。如果前者为硬技术,则后者为软技术。但作为技术,其共同特点是形式化的、客观化的手段。也就是说,这些技术都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可以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的,是波普尔3个世界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的要素。

尽管技术支持子系统本身具体相当程度的公共

性、非个人性,但其应用高度依赖于规划团队的素质。因为这些技术应用涉及到对其适用性的边界条件识别问题,即涉及到信息支持子系统的功能发挥问题。所谓信息支持系统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下,将各种规划的技术运用于特定地区、特定矿种的规划所需的信息总和。实际上,信息支持系统不仅涉及特定地区和特定矿种,规划主体需要识别各种边界条件,而且也涉及对资源规划有意义的制度因素、识别适用的规划技术,创造性地引入新的规划技术。这一系统甚至也涉及各领域专家相互合作中所表现的默契、相互交流等。因此,在矿产资源规划的信息支持系统中,不仅存在大量的数码化信息,而且也大量存在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其属于波普尔3个世界理论意义上的第二世界的要素,这使得矿产资源规划的优化性进一步依赖于高素质规划队伍的存在。

总之,高素质规划队伍的存在是高质量的矿产资源规划得以完成的先决条件。这不仅是由制度支持系统引致的产权效率、智力效率的要求,同时也是由技术支持系统和信息支持系统所引致的信息效率(知识的使用效率)的要求。

2 意会知识与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优化

在创造性地利用各种方法及技术过程中,高质量的矿产资源规划需要各种信息,对于规划团队而言,制度与技术也表现为信息和知识的支持。其中有些是结构良好的信息与知识,但也不乏许多非结构化的信息与知识。结构化的信息与知识都是可以用形式化语言,如科学语言、数学语言、计算机语言等表达的信息与知识。由形式化语言表达的信息与知识所涉及的问题,即结构化问题通常有确定的求解方法及实现技术。但非结构化信息与知识一般是不能由形式化语言加以表述的,与此相关的问题,即非结构化问题通常没有明确的求解方法与实现技术。非结构化问题的解决需要行为主体极大的创造性努力。

不能用结构化语言甚至用自然语言表达的信息与知识,即非结构化信息与知识通常被称为意会信息或知识。“人类知识有两种:诸如书面文字、地图或者数学公式里所展示出来的,通常被人们描述为知识的东西仅是其中之一而已;另一些未被精确化的知识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类知识,如人们在实施某种行动时具有的关于行动对象之知识。如果我们将前者称为言传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后者则

称为意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 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说人类始终意会地知道自己正在支持 (holding) 自己的言传知识为真”^{[7] 111}。

在矿产资源规划所需要的信息系统中, 意会信息与知识的把握与有效利用是实现规划矿产资源最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矿产资源规划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划定鼓励、限制和禁止勘查、开采的矿种和区域, 并进一步论证重点开发的方式。所谓“鼓励、限制和禁止”都是相对的, 它们是根据矿产资源供需的相对关系决定的。比如, 就某一矿种或某个区域被划为限制开发的矿种或区域而言, 其关键理由可能出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然而, 经济学家从来就是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权衡而找出其最佳平衡点的。

因此, 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考虑, 在某地区是否限制或鼓励或禁止某种矿产资源的开发或限制到什么程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该种矿产资源的需求程度。这样, 矿产资源的规划首先意味着对矿产资源供需形势的分析与预测。矿产资源的供需形势虽然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而由其市场价格得以反映, 但经济是一个巨系统, 矿产资源市场需求的预测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其中不乏经济学领域专家的个人洞察性、意会性信息与知识支持。如当预测给出某种矿产资源的市场需求将在 5 年内进一步增加的判断, 甚至给出增加的定量性的判断时, 在支持这一预测性判断的信息中存在着大量的意会信息与知识。

实际上, 按照迈克尔·波兰尼认知结构理论, 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 除处于意识焦点的事物外, 还有对事物整体认识起支援性作用的支援意识。“人们经常能在注意力从未聚集细部的前提下理解整体, 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此时, 我们其实对细节一无所知, 如果说得更准确一些, 应该是焦点性的无知 (focally ignorant)。我们仅是从这些细节结合之后所具备的意义入手, 支援地体知到这些细节, 但并不知道这些细节本身究竟是什么。……那些为我所知, 但不处于意识焦点的细部知识是无法一一指认出来的”^{[7] 124}。

因此, 断言矿产资源市场在未来 5 年内需求的具体情况时, 支持得出这一判断的各种细部, 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情况、国际经济的发展与变化情况、发生各种诸如战争等非经济变量变化、金融市场的变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等, 则是个人意会的成分占有相当比例的。

在矿产资源规划中, 通常也会遇到最优开采顺

序的确定问题, 对此问题的处理涉及到大量支持性意会信息与知识。即使采用定量化程度较高的模型, 如层次分析法 (AHP) 等, 仍然无法避免意会知识的支持作用。因为, 影响矿产资源开采顺序的因素分 3 个层次结构: (1) 矿产资源优化开采顺序; (2) 影响矿产资源开采因素, 将其归纳为内外部 4 个方面 (矿区地质资源条件, 矿区开采技术条件, 矿区环境污染状况, 矿区周边地理经济状况); (3) 第 2 层的 4 个方面再细分为 18 个因素。运用 AHP 法进行评价的前提是获得相互比较的不同区域的这 18 个因子的量化指标, 但不同区域的这 18 个因子的量化指标却由不同的领域专家直接给出判断的^[8]。至于为什么给出这样的量化以及不同的专家为什么会给出不尽相同的量化指标等问题, 则具有很大程度的意会性。

除此之外, 优化的矿产资源规划还需要其他各种意会信息与知识的支持。实际上, 在矿产资源规划支持系统中, 不仅在信息支持子系统中存在意会信息与知识, 而且在制度支持子系统、技术支持子系统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意会信息与知识。因此, 意会信息与知识的获取与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矿产资源规划的优化程度。

3 团队的社会资本与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优化

矿产资源规划涉及到地质学、地理学、社会经济发展、空间经济结构与发展、矿产资源经济与环境经济管理、文物保护、旅游业发展、国家经济安全等学科知识。因此, 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学科领域专家合作的结果。由此可知, 意会知识的有效运用成为矿产资源规划实现最优化的重大问题, 因为意会知识是难以转移或转移成本很高的知识。因此, 矿产资源规划的优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规划团队各成员间相互合作的深入程度, 深入的合作才能有效促进各成员之间有关各专业领域特有的意会知识的转移。

为确保规划工作的效率, 矿产资源规划工作应由各级政府实行招标, 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基础上, 发包给有关中介机构、学术团体进行。然而, 实际从事矿产资源规划工作的团队有 2 种不同的组织形式: 存在行政组织关系的规划团队和不存在行政组织关系的自治性规划团队。团队合作的基本问题是: 由团队成员努力程度不可观察性而引起的投入不足。对于存在行政组织关系的团队, 可能由于彼

此通过行政关系相互结合而使得这种投入不足更为严重。因为,通过行政关系的结合可能缺乏彼此间合作的个人目标与价值取向的基础。为确保规划团队的合作效率,政府可以采用分阶段投资的治理结构。将某区域的矿产资源规划分别发包给2个规划团队,并确定在未来某一个适当的阶段进行检查与验收,以确定接下来的规划工作最终将由谁来完成。也就是说,通过中间验收淘汰2个最初规划团队之一,从而确保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优化。

采取种子投资以淘汰2个团队之一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带有竞争性的方法。它虽然可以避免规划的低效率,但规划的成本相对较高。为降低规划成本,一种可行的措施是将矿产资源规划项目发包给自治性的学术团队。自治性的学术团队因其成员是基于共同目标与价值取向而相互协作的,因此其成员的机会主义动机大大降低。这样,团队每个成员的投入不足问题也将大大减少,从而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

不过,自治性团队要成为有效率的规划团队,其基础不仅在于其成员的共同价值取向,而且还在于其他影响因素:成员是否互为社会资源、团队是否存在有效的社会资本及有效地沟通等。实际上,这些因素是成为有效团队的前提条件。

矿产资源规划不仅涉及大量意会信息与知识,而且也涉及多个领域专家相互间的协作。这实际上表明,规划团队中每个成员都具有相对优势的、为规划所需的支持性信息与知识。团队中每个成员专业知识、言语知识和意会知识自然成为其他成员可利用的社会性支持资源。原则上,虽然这种社会资源是实现规划优化的重要条件,但它也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由于这种支持性的知识资源只是潜在存在,因而也只是一种潜在的社会资源。要使其在现实中真正起作用,就必须在团队中建立有效的制度形式,即使使各成员掌握的专业知识也能在其他成员需要时提供使用的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指个人所拥有的作为其个人财产的社会结构资源^[9]。没有这种社会资本的存在,即使在团队成员中存在矿产资源最优化规划所需的各种专门知识,但这些知识仍不能有效地起作用。

矿产资源规划文本象软件产品一样,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性产品。矿产资源规划过程涉及多个领域知识的集成,所以它是一种知识密集型产品。从系统论视角出发,矿产资源规划文本产品本身不仅是一种产品系统,而且是一种极为复杂的产品系统。

当代人类学家奥尔·朱利安(Orr Julian)针对知识密集型产品系统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复杂产品系统的维护涉及到大量的、难以转移或转移成本极高的意会知识。不仅如此,而且每一个复杂产品系统的问题都具有其独特性^[10]。从复杂产品系统视角看,矿产资源规划文本完全具备奥尔·朱利安论及的这2个特点。

针对这种知识密集型的产品系统,不仅奥尔·朱利安的研究表明团队治理结构及成员间互为社会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其他经济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资本对知识转移及其有效使用的关键作用^[11]。

整个团队具有足够的支持性信息与知识,团队内部同时存在足够的社会资本,这两者是矿产资源规划达到优化程度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还必须确保团队成员之间足够的沟通与交流,否则即使有前2个条件的存在,也还不能最终实现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优化。

4 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无论从发展潜力看,还是从现实的就业压力看,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仍是中国今后长期的经济发展的现实和客观要求。然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虽然早已提出,但目前远未达到预期目标。这样,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支持作用的矿产资源实现最优化开发也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而矿产资源的最优规划又是其实现最优化开发的先决条件。没有最优化的矿产资源规划,最优化开发也就无从谈起。

矿产资源规划本质上是一个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影响其最优化实现的主要因素是规划团队对其成员所拥有的意会知识的有效利用。矿产资源规划的特点是:它涉及到众多学科领域专家的合作。因此,来自各不同领域专家的各自努力的投入程度难以观察,从而相互合作中团队成员搭便车现象就更为突出。因此,为确保矿产资源规划的最优化,根据不同情况,设计和安排适当的制度并发展团队内部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是极为关键的举措。

参考文献:

- [1] 殷俐娟. 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目标与作用[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05, 22(1): 48-52.

(下转第77页)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是实现政治沟通的重要保障。一般而言,媒体对政治议程的影响是一个三边互动的过程,即媒体、公众和权力精英之间的互动。媒体和公众在议程设定中的独立性较强,媒体通过报道引发公众的关注,公众向政府施加压力,引起权力精英的关注,从而设定某个议程;或者公众向政府施加压力,通过媒体报道,形成更加广泛的舆论压力,最后促使决策者进行某项决策。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公众、媒体、政府的三边互动存在不均衡问题,媒体和公众的独立影响议程的能力有限。因此,除了政府应保证媒体身份独立,从传统的行政监管转变为法律制度约束外,媒体自身更应当从简单的解释政策、帮助政府监督落实政策和执行中走出来,把自己作为众多政治力量的一种,充分发挥自己掌握话语权的地位,维护公共正义,努力创设和谐的公共政治空间,履行“第四种权力”的功能,发挥“预置、监督、贯彻、动员、渗透五个方面”^{[6]78}的功能,形成一个制度性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的独立力量,从而真正扮演起上行沟通和下行沟通的中介功能,在信息化时代发挥更突出的信息沟通作用。

4 结 语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和谐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政治关系的有效和谐。本文通过分析政治信任和沟通的关系及其

对于政治关系和谐形成的作用,发现只有进一步完善政治信任机制和深入拓展政治沟通渠道,才能构建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 杨宏山.当代中国政治关系[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 [3] 肯尼思·W·汤普森.宪法的政治理论[M].张志铭,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 [4] 李景鹏.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与政治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1994,14(3):34-37.
- [5] 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 [6] 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7]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
- [8] 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9]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步[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10] 戈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M].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1]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M].王靖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 李新春,刘二文,孙婷,等.矿产资源最优开采顺序决策模型研究[J].煤炭科学技术,2006,34(4):44-47.
- [3] 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4] Julian E Orr. Talking about machines: An ethnography of a modern job[M]. New York: IRL Press, 1996.
- [5] 约翰·布朗,保罗·杜吉德.地区之谜:硅谷的知识能动性[M].李钟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 赵传卿.中国矿产资源战略分析[J].中国矿山工程,2006,35(2):23-27.
- [3] 闫军印,赵国杰.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最优耗竭量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1):56-61.
- [4] 崔振民,傅群.现代企业两权分立的管理模式对我国矿产资源合理利用的启示[J].中国矿业,2006,15(1):77-82.
- [5] 成金华.矿产资源规划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 [6] 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桂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上接第63页)